

飛機快要起飛了，他們才把他押上來。起先我並沒有注意到他，我正忙着調整安全帶。我們這一排有三個座位，我坐在靠甬道的位置，中間座位空着，靠窗的位置，是一位東方女孩。上飛機前，我分明聽到她對送行的人說再見，一定也是中國人。我先佔了靠甬道的座位。她隨後上來，瞄了我一眼，就坐到靠窗的位置。從紐約到東京要飛十幾個小時。我一壁調整安全帶，一壁盤算是否應該和她打個招呼，或者等到起飛後再攀交情？同是中國人，路上能夠聊聊，也就不愁寂寞了。

「你是中國人嗎？」

我抬起頭，兩名警官站在我面前，他夾在中間，傻頭傻腦的咧開嘴。問話的是靠近我的一位警官。

「是的，有甚麼事？」

那位警官指指他。

「這位先生是你們同國人。他被美國政府遞解出境。我們替他買了飛機票，直飛臺北。他不懂英語。能不能請你在路上照顧他？」

警官的嗓門很大，該死的義大利佬。前頭的乘客都回過頭來，好奇的朝我們看，我有些惱火。

「當然可以。可是我要在東京換飛機。到了東京以後，我怎麼照顧他？」

「那個你用不着耽心。到了東京機場，我們會有人安排。不過在安卡拉機場，這位先生不可以離開機場。懂嗎？」

我說當然懂，但我並不是替美國政府押解犯人，我只是照顧我的同國人。如果他自己要在安卡拉下機，我恕不負責。那位警官不理睬我，招招手，一位空中小姐跑過來。

「這位先生被美國政府遞解出境。我們替他買了飛機票，送他回臺北。他不懂英語，所以我請他——」警官指着我：「照顧他。這位先生不可以離開飛機。請妳注意一下。」

空中小姐支吾了半天，最後說，她不能管這些。另一位空中小姐擠過來，問究竟是怎麼回事。前面的老太婆一直朝這邊瞪眼。我怕這位義大利佬又要再播放一次，連忙說，我可以負責。警官聳聳肩，說沒事了，遞給我一個信封。

「這是他的飛機票，請你替他收着。到東京，會有人安排接他。」

警官走了，我打量打量這小子。他正咧開嘴，對我傻笑。他身材不高，腰幹結實，紫黑色臉孔，笑起來，臉皺成一團，我看不出他的年紀。

「你請坐吧。」

「謝謝，謝謝。」

我本打算側過腿，讓他坐進中間的空位。轉念一想，還是解開安全帶，自己坐到中間的位置，讓他坐靠甬道的座位。靠窗位的女孩正專心看一本旅行雜誌，好像不知道剛才發生的一幕。他坐了下來，將一個藍色的袋子塞到座位底下，又對我笑笑。

我把信封交給他。

「他們要我在路上照顧你。這是你的飛機票。」

「謝謝，謝謝。真勞駕您費神呀。」

「那裏，應該的事。」

那個死老太婆仍然朝這邊瞧，我狠狠瞪了她兩眼，她才轉過頭去。

「請問貴姓？」

「敝姓李，木子李。您是？」

「黃國權。國家的國，權力的權。」

「多謝黃先生幫忙呀。請抽一根？」

他遞過一包肯特牌香煙，我趕忙說，飛機快起飛，不可以抽煙。他把煙收起來，很不好意思的說對不起。警戒燈亮了，我幫他綁好安全帶，心想這次旅程可真不愁寂寞了。那個女孩仍在看旅行雜誌，似乎專心得很。

「李先生是第一次坐飛機嗎？」

「以前在臺灣常坐呀。螺旋槳的，當然不能和這個比。那時我在澎湖服務，回高雄有時坐船。申請到搭機證的時候，也搭飛機。」

「李先生過去在海軍服務？」

「早就離開了。幹海軍的暈船，像話嗎？人家暈了幾年就熬過去了，我可一直暈船呀。在澎湖待了一陣，還是離開了。這些年，甚麼事都幹過一陣，最後還是上了船。有甚麼辦法呢？吃這行飯吃定了。」

「怎麼會跑到紐約來？」

他不好意思的笑笑。

「跳船了。您別見笑，幹我們這一行的，有幾個不跳船？海員薪水太低呀。一個月硬碰硬七十五塊美金。以前還可以帶些私貨，現在抓得兇呀。上岸一個人只能帶四塊肥皂，五條香煙，一瓶酒，管得了用嗎？大家一有機會，到紐約就跳船。一條船，三分之二的船員跳了船，都是有。能夠在紐約中國餐館打工上一兩年，省吃儉用的人可以存下幾千塊美金，比幹船員強多了。就是怕被移民局逮着了，遞解出境。我這次也是晦氣呀。才跳船，沒有做滿六個月工，我們的餐館就被移民局查了三次。前兩次躲過了，這次卻沒躲過去。那天要機靈一些就好了。」

他嘆了口氣，閉上眼睛。靠窗的女孩一直在讀同一頁雜誌，已經讀了五分鐘了。

「你被送回臺灣，沒有關係吧？」

「怎麼會沒有關係？要罰錢呀。罰兩萬塊錢，而且半年不能上船。第二次再被人送回來，罰兩年不能上船。第三次，就永遠不能上船了。這是我第一次跳船，錢也沒賺多少，就被送回來，您看倒霉不倒霉呀？」

「下次小心一點，多賺點錢，補回來吧。」

「我也是這麼想。可是回去還得再等半年呀。坐吃山空呀，物價又漲了。我老婆前個月來信，還要我做個兩年工再回去，沒想到……紐約跳船的中國船員有兩萬多人，就偏偏輪到我倒霉！假如能做滿兩年，存個幾千塊，我就往移民局一站，讓他們送我衣錦還鄉。有了錢，我就回去開個小雜貨店，也省得躲躲閃閃的，受洋鬼子的氣！」

也許他講話聲音大了一些，那個死老太婆又回頭看我們。我撞了他一下，大家都不講話了。飛機到達三萬尺高空時，警戒燈滅了。空中小姐甜笑着，推過飲料車來。我問他要不要甚麼

飲料，他問明白不要付錢後，要了一杯橘子水。我要杯可樂，靠窗的女孩也要可樂。三個人各自喝冷飲，我還是沒有機會和那個女孩搭訕。正在搜索枯腸時，他猛然問了一句。

「黃先生，您有派司沒有？」

我一時沒有聽懂。

「甚麼派司？」

「派司呀。就是那個綠卡，移民局可以不抓你的派司呀。」

「哦，你是不是說永久居留卡？」

「對、對。就是那個派司呀。您有沒有？」

他等候着我的回答。我似乎感覺得到，那女孩也在注意聽我的回答。我猶疑了一下，毅然點點頭說：

「我有的。」

「您真是好福氣呀！」他不勝羨慕的說，「有了派司，就不怕移民局抓了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前年跳船的，不知怎麼弄，給他申請到派司。他現在升到二廚師，還打算把老婆接到美國，將來自己開餐館，混出頭了呀。他很夠義氣，我們跳船，就先投靠他，他幫忙找的事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朋友。中國人還是肯幫中國人的忙。不知道您肯不肯留個地址給我？」

他左掏右掏，摸出一個小小的黑色記事本，我填了地址，他連聲道謝。女孩放下杯子，又拿起旅行雜誌。

「您是回國省親吧？了不起，了不起。光宗耀祖呀。」他湊過頭來。「黃先生大概還沒有結

婚吧？回臺灣，也可以物色物色對象啦，誰不想攀這門親呀？一人得道，雞犬昇天呀。」

他胡言亂語不要緊，我偷瞧女孩，她臉色有些發白。我趕緊撞撞他，他莫名其妙，連聲說對

不起。女孩放下雜誌，第一次正眼望我們。

「請讓一下子好嗎？」

我解開安全帶站起來，他也站起來。女孩低聲說謝謝，背朝我們挪出去。等女孩走到甬道盡頭的休息室，我不能不提醒他一句。

「請你不要再提派司和成親這些事好不好？」

他眨眨眼睛，哦了兩聲。我覺得有必要解釋一下，又想不出該說甚麼。

「人家也許會嫌我們太吵。」

這句話，大約傷了他自尊心，他竟不肯再說話，掏出記事本，抽出一張照片，自顧自欣賞起來。女孩回來了，我們又站起來，讓她擠進座位。我注意到她臉上稍微多了些化粧。女人就是喜歡這一套。

他安靜欣賞了一會照片，重重嘆口氣，把照片和記事本收好，不一會就靠在椅背上睡着了，鼻息均勻的發出鼾聲。我朝女孩做了一個鬼臉，她微微一笑。我們就隨便聊起紐約的冬天、一女中、江學珠、少棒賽，後來又發現我們共同認識一些熟人。飛到阿拉斯加的安卡拉機場時，我們

已談得很投機了。

我們在安卡拉機場停了五十分鐘。我陪女孩買了兩件土產，她說要帶回臺灣送給親友。再回到飛機裏，那位海員已經醒過來。他似乎忘記了幾小時前的不愉快，又拿出照片，要我們看他的老婆和兩個孩子。兩個孩子長得很秀氣，一點也不像他，也不太像他老婆。我們誇讚了一番，他情緒高昂多了，講起他過去在海上的一些趣事，女孩聽得不住地笑，倒使我意外的發現她的笑聲很悅耳，很女性化。海員談起他準備開的雜貨店，談着談着，自己又嘆口氣，掏出照片看看，再度沉默了。我們都有些疲倦，離開安卡拉不久，用過晚餐，空中小姐熄滅了機艙內的大燈，女孩先睡着，我沒多久也昏昏睡去。

「快到東京了。」

是海員把我們喊醒。機艙內已是燈火通明，大家都站起來，活動一下筋骨。女孩又跑去化粧。機艙外還是黑夜。我和海員算了半天，才算出正確的時辰。他有些緊張，怕東京的移民局官員刁難他。我勸他不必擔心，並且答允幫他應付移民局的官員。我對了機票，發現我們三人都乘同一班飛機回臺北，所以無須在東京分手。他又高興起來，再三謝謝我。

東京機場比想像更亂。我們糊裏糊塗就通過了海關，也找不着移民局的官員。機場的日本人居然大部份不懂英語。我交涉了半天，沒有結果，只好放棄。依我的看法，美國移民局根本就沒

有通知東京有關他過境這回事。反正他已經有機票，有我照應，回臺北並不成問題。我把這個想

「告訴海員，他望着擁擠的人羣，臉上突然放出光采。

「好極了。我就在此留下來。再見，謝謝您一路的幫忙呀。」

「你要去那裏？這是東京，你能去那裏？」

「我回美國去。東京我來過一次，神戶我有熟人在船公司做事。我找他們，幫我偷偷弄上一條船，我就又回美國呀。」

「這不成了偷渡嗎？太危險了。還是先回臺灣吧。你不想回去看看家人？」

「看他們做甚麼？我去美國打工，賺一筆錢再回家，您請放心，我有辦法。再見！」

他消失在人叢裏，不一會又鑽回來。我以為他改變主意了。他笑着搖搖頭，掏出記事本，撕下一頁給我，又塞給我一卷鈔票。

「這些錢，請您帶給我老婆。紙上有她的地址。謝謝，謝謝，再見。」

他走了我才想起，帶這麼多美金入境，可能是犯法的行爲，但是再也找不到他了。沒有辦法，我只好決定冒一次險，發誓下次絕不做這種傻事。那個女孩說我不必發愁，回國省親的留學生，入關並不會仔細檢查。她很替我抱不平，女人家究竟比較富同情心。我暗自慶幸。這一段旅程究竟不是完全沒有收穫。

在臺北的四星期，我忙着拜訪親友和相親，約會了一打以上的女孩子，卻沒有一個情投意合。閃電式的愛情，畢竟可遇不可求。臨走前，我記起海員的囑咐，特地跑了一趟高雄，將錢送到他家。他的太太只知道他被送回臺灣，最近一直沒有收到他的信，正在焦急。我告訴她一切都很順利，他又回美國打工。兩年後，他會帶一大筆錢回來，他們就可以開雜貨店了。她高興得跳了起來，再三說我是大恩人，還要兩個小孩出來謝謝我，反而使我很不好意思。

回紐約後，我繼續和那個女孩約會，感情頗有進展。如果不是她的家人有些意見，我們恐怕已經訂婚了。我並不太急。這種事情，急也沒有用。何況，實在不成，我總可以再回一趟臺灣。她也知道。我猜想她比我還着急。感情這樁事，就是這般微妙。

我幾乎已經忘記了海員的事。上個星期，我接到從巴拿馬一家船公司寄來的一個包裹，裏面附着一封信。

『親愛的黃先生：

敝公司來往日本及中南美洲航線的一艘貨輪上，三週前發生了一樁意外。一位非法登輪的船員，在裝運香蕉時，不慎失足落入大貨艙，經急救無效死亡。死者非法登輪，敝公司無法負責其意外死亡。除懲辦該輪大副外，並將嚴查敝公司神戶營業處，是否有失職之處。死者未留下任何證件。經檢查死者的遺物，在記事本中，找到你的地址。我們寄上死者的遺物。請轉交死者家屬，並代致最深的歉意。

你誠摯的 羅伯史奈德』